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一九）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八三期 ——  
（二〇〇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406d）

---

【往事追忆】大西北步行串连历险记	方建勋
【不堪回首】扫地出门记——记哈尔滨师范学院的文化	倪美生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往事追忆】

大西北步行串连历险记

• 方建勋 •

◇ “三家村”集体出逃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在西安一所中学任教，大学毕业刚两年，什么都不懂，年轻气盛，有股鸡蛋偏要碰石头的牛劲。可是，当时中学教师正是“红五类”红卫兵狩猎的最早最直接的对象，我就是其中一员。再加上对那些红卫兵奉为圣旨的“血统论”颇有微词，处境就更加危险。

更没想到的是，一件天大的祸事突然降临。于是我和姚太运老师、吴疆老师，所谓的“三家村”全体成员，不得不在仓皇中集体出逃。

这个天大的祸事，其实是自己找的。

西安外语学院的王庚虎老师，与我和姚太运交好，在一个冬夜里，喝了一点酒的三个年轻人，兴奋起来，大谈特谈党和国家大事。以年轻人的尖锐和敏感，无所顾忌地讲了一大通，终于，王庚虎说出了惊人之语。

“你们看，林彪，什么样子！尖嘴猴腮，一脸奸相，只会跟在毛主席后边摇《语录》，几个字也写得像狗爬……”

当时是在姚太运屋里，墙中间贴着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宣传画，毛主席后边就是林彪摇着《毛主席语录》的玉照，宣传画上有林彪“四个伟大”的题词。

姚太运听到后，十分惊恐，声色俱厉地说：“王庚虎，你再胡说八道，我马上赶你出去！”

王庚虎是西安外语学院颇有名气的青年讲师，姚太运也是西安外院毕业，宽脸，大眼，络腮胡子，与王庚虎是好友。因为都喜欢文学，就把我也拉到一起，三人成了至交。姚太运不让王庚虎“胡说”，并不是观点上有什么不同，而只是因为他的“地主出身”使他不敢招惹是非。王庚虎则自恃是“三代贫农”，根红苗正，敢于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

那晚一席危险的谈话后，王庚虎再也没有来找过我们，不知他是不是出事了；同时，学校的红卫兵对我和姚太运也显然加强了防范，这使我们都担心那晚的谈话被人听到后告密了。危险已向我们逼近。我们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决定趁大串连掀起第一个高潮的时机出走。我们叫上了同被打成“三家村”的吴疆老师，约好时间在火车站广场会齐。

到达火车站，已是人如潮涌，我们的心安定下来，人愈多，就意味着我们愈容易逃离。

正当我们暗自庆幸的时候，我校的一位红卫兵负责人“牛司令”对直朝我们走来了。

“方老师，你们是要去串连吗？”

“哪里呀，你没看见都两手空空么？听说车站热闹，我们来逛一逛……”我说得很轻松。

“革命大串连嘛，革命师生都可以参加的，只是今天晚上姚老师还得到队部来一趟。你们明天要走，我负责找车送你们……”

“好呀，有牛司令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我只想早早把他打发走。

他看看我们，又看看车站广场拥挤的人群，好像在猜测我们有没有机会逃走。最后，他悻悻地走开了。我看着他越走越快的身影，揣摸他可能是回学校去叫人来拦截我们，这时车站还没有放人进站，我们决定立即分散，往人最多的地方挤，人越多，“牛司令”就越难找到我们。

我们学校离车站很近，“牛司令”回去叫人来，不过是十多二十分钟的事。果然，我们分散到人群中后不久，我就远远看见他带了二十多人赶来了。正当此时，车站放入进站了，我赶紧随着人海前进——其实我并没有动，只是把双肘放在挤来的人们肩膀上，就被“抬”进了车站，抬上了最挤的一节车厢。

姚太运一直跟在我身后。当我们正在寻找吴疆时，却看到“牛司令”带着一帮红卫兵正在下边搜寻我们，我下意识地挪动身躯想避开“牛司令”的视线，但哪里能挪动分毫！我立刻明白，我们已经胜利了，“牛司令”他们就算发现了我们，隔着拥挤的人群也无可奈何。

车终于开动了，随着汽笛的一声巨响，我们绷紧的神经总算松弛下来。我和姚太运也才得知这趟列车是开往乌鲁木齐，运行时间是三夜两天。

在车上，我们意外地看到了捉拿“炮打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王庚虎的《通缉令》，难怪“牛司令”要急着找人来拦截我们。如果我们晚走一步，就会大难临头了。

我和姚太运商定，我们决不向任何人承认这件事，也不对吴疆说这件事，以免他也成为“知情不报”者。吴疆比我们大一两岁，湖北人，文质彬彬的书生相。有一次在校园里，他看到我学生厕所出来，大吃一惊地批评我：“学生如果经常在厕所里看见老师，那老师还成其为老师吗？”我刚分配到这个学校时，看到教师有专用厕所，还写着“严禁学生入内”，曾大大吃惊。“文化大革命”一来，哪里还有什么“师道尊严”，教师被学生殴打甚至打死的事已经不是新闻了。如今，吴疆这样讲究“师道尊严”的教师也不得不毫无尊严地仓皇出逃了。

我们终于在列车中段找到了吴疆，我心中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 ◇ 陶峙岳盛情款待不速之客

宛如洪水开闸，满满一列车红卫兵、“革命师生”从乌鲁木齐火车站冲了出来，憋了六七十个小时的脾气和力量正在到处找寻发泄的对象。而乌鲁木齐明净清澈的天空，一场大雪之后银装素裹的大地，清冷甜润沁人心田的新鲜空气，把那一股乖戾之气无形地消融了不少。人们竟驯服地在汽车站排起了长龙，等待那总是迟到的公共汽车。车来了，两个漂亮的女售票员一个在车上，一个在车下维持秩序。美貌也是力量，这些年轻的乘客们一个跟着一个上车，竟然是秩序井然，汽车也尽了它最大的容量往里装，一个又一个，装得不能再满了，连售票员也上不上去了，突然，车开动了。

“呀！”人们都惊呼了——售票员还在下面。

“啊！”只见那女售票员熟练地飞身跃上已开动的汽车，那美丽的身姿在车门前晃动了一下，就闪进车厢里去了。显然这已是她十分熟练的基本功了。

“他妈的，我到哪里去找我的伙伴，都是第一次来乌鲁木齐呀！”一个被甩下的红卫兵大声叫骂。

“乘下一趟车，他们很可能就在前面一站等你。”我见他很是惊慌，便上前安慰。

“方老师，真巧，怎么你也来了乌鲁木齐？”一位高大结实的学生闻声走了过来，他叫綦建安，高二的学生。文革开始后不久我就被分配到他们班上，实际上是接受学生的监督、教育。姚太运和吴疆则分配到了高二和高三。跟綦建安一道的还有他同班的刘磊磊和高二的卜顺清。异地相逢，不仅师生界限消除了不少，还真有同校一家亲的感觉。

师生们很快就谈到了最现实的问题：上哪儿吃、住？

“先到陶峙岳那里去吧。”吴疆说。

“好呀，吴老师和陶峙岳是亲戚，陶峙岳是新疆的老二，新疆建设兵团司令，”姚太运补充和解释说。

吴疆和陶峙岳是亲戚，我此刻才知道。但是我有一个关系相当亲密的学生曾雁行，倒是多次提到过陶峙岳。曾雁行的家因有大字报揭发是曾国藩的后代而被抄，但后来又不了了之，据说是周恩来签发给他父亲曾震武的委托书起了作用。曾雁行多次对我谈到，他父亲曾震武原是陶峙岳的参谋长，后来协助陶峙岳举行新疆起义，因此他父亲解放以后当了部长、院长，1958年病逝。陶峙岳对他家一直是很照顾的。

“这么多人去，太打扰了。”我有些踌躇。

“走吧，有我呢。”吴疆说。他办事一向稳重，既然他都这样说，肯定是去得的。

于是，一群人就往陶峙岳家里赶。

令我多少有些意外的是，陶峙岳盛情接待了我们这伙不速之客。陶峙岳年过70，但精神健旺，个头不高却给人威武有力的印象，他热情好客，像对待老朋友一般对待我们这群新来的年轻人，使我们很快就不感到一点拘束了。茶喝过一遍，寒暄之后，他开门见山地说：

“我是保皇派，你们打不打倒？王恩茂有什么不好？我十多年和他在一起，怎么一点也看不出来。你们可以在乌鲁木齐看一看，在整个新疆看一看，是成绩大还是缺点多，总要有个基本估计呀！我是老新疆，我了解情况，谁要打倒我都没有关系，我就是这样说。我是一个老军人，经历了时代的变迁，新与旧我有比较，共产党和国民党我有比较，谁是谁非，我心里很清楚。”

老将军依然是浓重的湖南口音，说话时声音洪亮，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听这样一个有特殊身份的人论及当前时世，又全是坦陈肺腑之言，我感到又新鲜又受启发，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考察当前的运动。

“今天清茶一杯怠慢了大家，但有一样东西却不可不尝，那是我们新疆最好的新品种梨，兵团搞了十来年才弄出来，它可是我们兵团的骄傲，俗话都说：‘不食雪山梨，新疆也白来’，快快拿出来请客！”

应声而出的不是警卫员，而是十七八岁和二十来岁的两位美得惊人的大姑娘，在座的只觉眼睛一亮，两位姑娘就已经托着盘子笑吟吟地入桌了，她俩轻挽衣袖，两双玉手比赛起削梨来了。

“这是我的两个宝贝孙女，你们就叫大陶、小陶好了，她们一个上大学，一个读高三，和你们正是同年龄，谈得来，你们一块谈谈，一定比我这老家伙讲的中听。”

这老人真是古道热肠，毫无戒备之意，吴疆就算是他很近很亲的亲戚，但另外五个人却全是第一次见面的外人呀！何况，当时新疆人对外地来串连的红卫兵、“革命师生”大多存有极强的戒备心。我怀着敬意目送老人迈着军人的有力步伐走开了。

“爷爷认为，信任他的人才来找他，来找他的人都朋友。”小陶似乎看出了大家的心事，轻言浅笑作了解释。大陶则只是笑笑，认同了妹妹的说法。

“这梨真好吃，又甜又汁多，一点渣都没有，是怎样培育出来的呢？”姚太运到底是结了婚的，又比大家见多识广，很巧妙地转到大家都有话可说的话题上，“我可是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骨碌吞下去，味道都没有尝仔细。”

两姐妹也都笑了，大家谈了一会儿梨，又谈了一会儿新疆和建设兵团，话题转到当前的运动，便又沉默下来。我忽然想到一个新话题，自己先激动起来：

“步行串连，怎么样？我在列车上就听说步行串连，如果我们从乌鲁木齐出发，全靠双腿步行走到北京，我们会亲身感受祖国有多么辽阔。我们的每一步都将踏在祖国的大地上，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在做什么，说什么，想什么，我们都将亲眼去看，亲耳去听，亲身去体验，我们将获得丰富真实的知识，我们的身心和意志都将接受艰巨的考验。”

我一定讲得很动情，从大家神采飞扬的目光中看得出来，大家都被这个想法吸引住了。其实我们刚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筋骨还没有舒展，头脑还有些晕眩，可是我们年轻呀，年轻加上对生活的热情向往，注定了我们不会去计较什么艰苦、困难。

这个热烈的话题竟然谈了一下午，没有人反对，全体采纳。晚饭后，大陶亲自把我们领到

新疆医学院接待处去休息，她在那里读大二。直到把六个人的一切都安排得妥妥贴贴，她才告别而去。

#### ◇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诞生

第二天一早，大陶就到医学院来看我们了，其时，只有我一个人起床了，怕吵醒大家，我俩便到花园散步去了。乌鲁木齐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医学院就是这个城市的一颗明珠。在美丽的校园里，大陶关切地告诉我，步行串连比我想象的要艰苦、困难和危险得多。戈壁滩被人形容为死亡之湖，唯一的生命线就是那根细长的弯弯曲曲的铁路，而它却远离城市和人烟，在戈壁滩上大扭秧歌。每天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冻掉耳朵、鼻子的事时有发生。最可怕的是风沙，葬身在狂风和沙海中的人不计其数。此行要经过几处风区，十级大风下人无论如何不能控制自己，风会把人刮得不知去向，沙会把人埋得无影无踪。冬春正是狂风肆虐的季节，此刻去穿越戈壁滩近于拿生命去和无情的大自然开玩笑。还有就是严重缺水，别看我们这里是大雪覆盖，一进入戈壁就没有一片雪，一滴雨，那些被风刮走的人，要么是被沙埋掉，要么是活活渴死，有经验的人被沙埋掉时都知道掩鼻凿孔，维持一息，待风过后，再挣出沙堆以求生路，但没有水却是无法可想，所以说离开了铁路就是离开了生命线……

她滔滔不绝，情意殷殷，显然她昨晚向不只一个熟悉情况的人进行过详细咨询，才如此慎重和有说服力地进行劝阻。最后她建议我们，如果一定要步行串连，就作好准备，从兰州或西安出发好了，千万不要在新疆戈壁滩上冒那个险。

我很感激她的关心，不觉就和她讲起了自己的家乡成都，又讲到了我任教学校所在的西安。我讲到，有一次我带学生到距西安不过百里的山区劳动，贫困的状况使我惊诧万分，一盒火柴也可当做礼物赠送。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个一条大腿齐根断了的青年农民，他无父无母无妻无子，手里的铁锹就是他的另一条腿。他是队里的强劳力，他一只腿钉在地里，用铁锹翻土，凿得深翻得快，再没有第二个人翻土赶得上他了，包括最健壮的农民。他每天干十个小时，挣的工分最多最多，但是所得也仅仅能够糊口，他太耗粮了。这个青年农民给我留下的印象恐怕一辈子也忘不了，穷，太可怕了，贫困，太可怕了！倘若他不是太穷，再学点文化，凭着他那坚毅如钢铁的意志，何愁学不会一些技艺，装上假肢，他又为何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

“我总想找找穷根在哪里，大家再到一起挖穷根。甘肃不是很穷吗，戈壁滩不是很荒凉吗，都要实地看了，才会真正懂得，这个青年农民就叫我懂得了穷困的可怕。如果不挖掉穷根，他就很可能翻一辈子土直到不能动弹，愚公移山，还有把山挖平的一天，他翻土却是永无尽头，他总不能把地球挖穿，他又没有子孙可以代代相传。”

我莫名其妙地讲了一大通，我知道激动已使我离题万里。可是大陶却静静地听着，不再劝我打消步行串连的念头了。

在后来的一个星期里，大陶经常来找我们，带我们参观乌鲁木齐市容，介绍生产建设兵团和新疆的成就，也讲她们医学院的生活。但她主要的任务是带我跑自治区政府和自治区党委。终于，自治区党委办公室在百般劝阻无效后，同意借支800元，资助我们的万里步行。

“你们千万不要离开铁路，万一在戈壁滩上失了踪，我们就是派直升飞机也找不着人呀！”这是党委办公室主任最后的叮咛。

我们用这笔钱，在大陶的参谋下，一人买了一件老羊皮大衣，光皮没有布面，暖和而又省钱，是北方农民最看得上的那一种，此外，每人一双羊皮手套、一套棉衣和帽子、一双皮靴、

一双大头鞋、一双毡筒、一支手电。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姚太运突然提出了问题，“我们都不是红卫兵，这路上怎么走？”

这个问题让大家都作难了。

“这样吧，綦建安、刘磊磊马上去买几尺红布，做一面旗，六个袖套，写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们不就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红卫兵了吗？”我说，其实我也不知道怎样才算红卫兵，需要什么手续和谁的批准。但努力去做好事，宣传毛泽东思想，总没有错吧？

但是谁都没有动，綦建安看着我，可能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有什么不对吗？我们事实上就是去宣传毛泽东思想，如果一定要谁批准的话，自治区党委出钱资助我们就是一种批准。我们打着红卫兵的旗号不是去招摇撞骗，我们要为此去吃苦，去探险，甚至牺牲，这件事由我负全部责任！”

大家都哄然叫好。吴疆还向我竖起了大姆指。

#### ◇ 险些迷失在戈壁滩

我们这支六个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出发了，没有仪式，没有人送行，身材魁梧的綦建安打旗走在前面，其余人鱼贯相随。早晨的空气格外清冷，新做的红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更显出一点悲壮的气氛。我们默默地告别了乌鲁木齐，告别了这个冰封雪冻的美丽城市。别了，手抓饭；别了，烤羊肉；别了，医学院的维、汉姑娘们；别了，冰清玉洁而又热情似火的陶家姐妹；别了，慈祥的老人——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陶峙岳将军！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背着沉甸甸的背包，除棉帽、手套外，把新买的羊皮大衣、棉衣裤、皮靴、毡筒、大头鞋统统打在背包里，每个人所负的重量都超过20公斤，这是我们此行的物质保证，虽然重了一点，但却没有一个人把它当做负担。吴疆的背包顶上还架着一把新买的二胡，颤巍巍的，有如他单薄的身躯。六人中他年龄最大，27岁，身体最弱。我走在他后面，不免看着他的背影暗暗担心。他前面是年龄最小的刘磊磊，17岁，走起来一冲一冲地很有余力的样子。卜顺清跟着綦建安默默地走着，他是六个人中最安静的一个。

没有风沙，在一望无际的旷野中，六个人沿着铁路线，渐渐深入到戈壁滩中了。我走在最后面，忽然觉得我们是多么渺小和孤单。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把这个念头压了下去。

第一天，在风和日丽的情况下，我们沿着铁路线走了两站。虽说只是两站，却也有96华里，戈壁滩没有人烟，客车站没有必要离得那样近。我们意外的是，到站时，比出发的时候风光多了，竟受到了车站职工和家属的夹道欢迎，还有锣鼓家什助兴，我们都觉得眼眶湿湿的，很受感动。原来，自治区党委不愿意倡导步行串连，认为危险太大，但又不能违背中央精神而公开阻止，于是他们采用了劝阻和冷处理的方法。但是，车站仍然接到了双重指示：自治区和铁道部的，要求确保红卫兵的安全，确保接待任务的胜利完成。我们是第一批从乌鲁木齐出发的步行长征队，受到如此隆重礼仪正是情理使然。

简单的欢迎仪式后是热腾腾的大馒头招待。站长告诉我们，只要是自治区内的车站里，热馒头是保证少不了的，但到了甘肃，不要说热馒头，有窝窝头吃就不错了。吃过后，每个人都得到了一盆滚烫的洗脚水，比热馒头还可爱的滚烫滚烫的洗脚水。我们都洗了很久，水凉了才恋恋不舍地擦干脚穿好鞋袜——却没有一个人站得起来！我本要去倒洗脚水，刚站起来就一屁

股坐了回去。车站的职工抢着替我们把洗脚水倒了。我心里暗暗自责：糟了！太急了，第一天就负重40斤走了10个小时，忘记了循序渐进，这也是经验呀！

第二天，日上三竿我们才爬起来，两条腿都沉重得迈不开步。我心里明白，考验的时候到了。我告诉大家，今天必须走，今天走不动就永远走不动了。我们挣扎着，一天只走了一站，但是我们战胜了自己。第三天我们也只走了一站，大约也是四五十里，可是轻松多了，两条腿已开始听自己使唤，不再是迈不开、抬不起，好像绑了大石头似的了。可是，肩膀却受不住了，40多斤重的背包布带，一点一点地勒进肉里，实在无法忍受时便换一处地方，然而肩膀就只有那么宽，换来换去无可再换时，只得咬牙挺住了，但我们却越走越精神，越走越有劲头。

十天后，负重40斤、日行百里已经是我们的正常课程了。每天黎明从温暖的被窝里钻出来，扑进凛冽的寒风里，在只有石块和沙砾的荒漠里行走，变幻的只有云和风，和六个顽强移动的小黑点。当我们精疲力竭地走进投宿的车站时，职工们的毫不减弱的热情却仍然使我们深深感动，照例是夹道欢迎，照例是热馒头、滚烫的洗脚水。一位小站的已不年轻的站长曾这样对我们真诚地表达心意：

“接待你们是我们应该完成的光荣任务，可是，你们要知道，我们这里一年到头哪里见过人呀！每天过两趟的客车，也只有人影儿在车窗里晃动一下，一忽闪就不见了，全站连家属才六个人，见到你们心里亲得很呀！可别怪我们只用热馒头，咸菜招待你们，我们条件差呀！只拿得出这些东西，蔬菜、肉蛋过年过节都保不定有呀！”

吴疆二话没说，取下背包上的二胡，先来了几曲独奏，又给姚太运伴奏了几段秦腔。姚太运很卖力气地沙着嗓子暴喊，听众们竟难以想象地听得如痴如醉。三个学生也和职工们天南地北地扯开了话题。那天晚上过得真是愉快。

使我们和铁路职工更加亲密的是一次意外。

由于贪近路，我们那次离开了铁路线在戈壁滩中穿行，因为我们发现这条铁路设计得很有些怪异，首先是远离城市，既不沾村也不靠店，还常常呈现“S”形，铁路职工形象地称之为戈壁滩上扭秧歌，据说这还是苏联老大哥的杰作。我们这样穿行就是想在圆弧中找一条直线，估计两站60华里距离，直线穿行可能就只有40华里了，这个诱惑使我们大胆地离开了铁路线。

然而我们偏离了方向，没有日头，没有罗盘，已经有一个小时没有看见铁路线的标志——电线杆。天已向晚，我们还在戈壁滩上像无头苍蝇似地乱窜，危险这样快这样悄无声息地逼近了我们。戈壁滩上丢失六个人就如在一个大城市里狂风吹走六粒芝麻……

大家心里都已经慌乱，我沉重得喘不过气来，我自觉负着六条生命的重担。力主穿行捷径的綦建安、刘磊磊都快掉泪了，他们后悔自己的冒失给大家带来可怕的后果。我安慰了他俩，又镇定了自己，我向吴疆、姚太运提出：掉转身180度直走，或许可以找到铁路。我的理由是，我们是在弓弦上走，三个方向都不会离开这张“弓”的，只有走上与弓背相反的方向才会离铁路越来越远。好容易他们都听取了我的意见。虽然在认路上我是被公认最差的一个，但他们驳不倒我提出的“理”。更重要的是人人明白，东奔西窜或原地停留是最大的危险，何况夜里零下30度的气温，也不允许我们休息或躺下。

我们怀着求生的希望走着，我深信，我们是迎着铁路走去的。从不在前面带路的我，这次破例走在最前面，后边跟着五双将信将疑的腿。果然，远处出现了火光！我们毫不犹豫地向着火光迈进，越走越近了，大约还有好几里远就听见人们焦急地呼唤，我们大声回应，两处的人

们都循声靠拢，终于我们高兴地抱在一起。

原来是站里接到上站的电话，询问步行队是否到达，他们一等再等，上站的电话也是不断催问，说此事已惊动了自治区党委。他们赶紧派人寻找，但那是大海捞针，最后有人想到燃起火堆的古老方法，果然一试就灵。若没有铁路职工像关心自己一样关心我们，也就没有以后的故事了。

#### ◇ 特等劳模的惊人壮举

然而，我们六人第二天还是一大早就匆匆出发了，要日行百里，就必须天一见亮就动身。又不能走到哪里就停在哪里，戈壁滩里的车站是我们唯一能落脚的地方。

快中午了，我们本已走得很快，但从后面传来的脚步声走得更快，大家不觉回身去看：好魁梧的一条汉子，又高又壮，疾风似地赶到我们面前，黑红的脸上眼睛格外有神，声音也很宏亮：

“我把你们忘记拿走的手电筒带来了，这玩意走在隧道里时挺管用，没想到快到车站时才把你们赶上，真有你们的！”

他性张，是工务段的一位师傅，他一早见到我们丢下的手电筒，给车站交待了一句后就追我们来了。没想到追了50多里，快到下一站时才把我们赶上。吃午饭时，老张特别叮咛说，快到风区了，风刮来了不要硬抗，要找背风处躺下，只要紧紧贴在地上，一般是刮不走的。饭后老张就匆匆回去了，我们心里都很过不去，为了一只手电筒，叫人来回奔波100华里。刘磊磊更是脸上发烧，他才走出不到500米就发现手电筒丢在站上了，但他却没有吱声，也没有回头去取。我们也没有埋怨，大家心里都明白，向前走一万里的勇气个个足够，却没有人愿意回头走一步。

“你们知道这老张是谁？”老张走后，招呼我们吃饭的中年站长说，“他是我们铁道部的特等劳模，他才了不起呀！一家伙就救了一千多旅客的性命！”

在大家的要求下，站长讲出了这段可歌可泣的惊人壮举。

那是1958年的冬天，张师傅在狂风肆虐时坚持巡查线路，他顺风而下，逐段检查，发现铁轨出了问题，而且根本无法在当时检修。他知道客车一小时后就会通过这里，顺风跑到下站去通知，最快也得一个半小时，他只有逆风而行，要赶到前面离危险处尽可能远的地方通知客车停下来。他弯着腰，掩着口鼻，顶风往上走，这谈何容易！进三步，退两步，踉踉跄跄，风却越刮越大，越刮越猛，前行已经不可能了，他只得爬在地上，用手肘和膝盖，借着枕木和道钉使力，拼命往前爬，手肘和膝盖上的鲜血洒了一路，最后他用血染的红布蒙在手电筒上通知了客车，客车因而得救了。把他送到医院后才发现他的手肘和膝盖上的骨头都磨碎了！可他，今天还和当年一样干着他的老本行，工务段上的苦活儿！

我们一个个都感叹了很久。我想，平凡中体现的伟大，才真正是伟大中之最伟大者。我已把他的音容笑貌深印在记忆中了。

#### ◇ 风区中的奇异行程

站长又讲了不少风区的事情，都很有些骇人听闻，说得大家格外警惕起来。当天晚上赶到



了下一站，我们已进入风区了。

我们仍然是一早出发，凛冽的寒气中有西风的刷刷声响，风慢慢增大增强了，感觉到背后有强力推动，我们是向东行的，风在后面只是大大地加快了前进速度，感觉上就像急流中顺水游泳一样，轻松而又畅快！我们比平时提前一个小时就到站了，人人都得意而且亢奋，脸上写着：这就是风区么，小菜一碟！

中午吃饭休息时，车站职工都劝我们第二天再走，一来是为了养足精神，二来是上午风都比较小，好像是印证他们说的话一样，一扇未关紧的窗子，“啪”的一声，玻璃碎了一地，风卷着寒气兜着脸把每个人都光顾了一下，幸而，立刻被堵上了，不然就很难再张嘴说话了。但是，此刻的我们怎么会被劝阻！个个精神十足，憋了多少天的劲，上午小试牛刀，一半的路程已被轻松拿下，岂能该胜不胜做缩头乌龟！我权衡情势，觉得大家体力充沛，时间又比平时充裕，便决定小憩半小时后出发。

当我们精神抖擞地再踏上征途的时候，情况已经大变了，狂风的猛烈状况已经完全超出我们的预计。此刻要是我们立即返回车站，虽然还得逆风搏斗一番，但还是绝对做得到的。可是我们现在正是走出酒店上景阳岗的武松，虽然酒已被“风”刮醒，却说什么也不愿丢面子走回头路。更何况只是几分钟的犹豫，我们已离车站千米之外了——因为我们不是在走，而是在跑，不是自己在跑，而是风刮得我们不得不跑。

“稳住脚步，不要分散，靠紧！靠紧！”我在风中回头大喊，比着手势传达意思。我心里明白，后退已不可能，只有沉着应付了。六个人很快一个挨一个结成队型，我走在前面，尽量把身体向后仰，虽然背着40多斤重的背包，我也几乎仰成了30°角却倒不下去，我眯着眼睛，盯着前方的目标，两只脚轻点地面，飞快地轮换着双腿，把背后的风力与前行的速度渐渐调整到最佳状态，很快就觉得自己变成了御风而行的超自然者，飘然间已在数里开外。倘若此时有人从远处望见我们，他一定会诧异这是支什么奇怪的队伍：人人都背着大背包，却一律后仰着不倒地，似乎每一个人身后都有一双无形的手在用力推着，每人的两条腿都像是在快速空蹬自行车，

风，狂暴猛烈而又奇寒；人，在险境而又和谐地处之自然。我们运动着，不感觉寒冷，借助风力，虽急奔而不觉劳累。在茫茫戈壁滩上体验如此奇异的行程，确乎是人世难以感受到的。但我们可一点也不敢放松自己，我们每一刻都在根据风力的变换，调整着后仰的角度和前行的速度，否则，不是后跌就是前仆，一人跌倒势必影响整个队伍，在逞威肆虐的狂风面前，最好的办法是尽快到达目的地，多呆一刻就多一份危险！

我们是幸运的，原要六七个小时的行程不到四个小时就走完了，当我们一阵风般扑进车站时，所有的神经，所有的肌肉都霎时松弛下来，整个身体都似乎瘫痪，再也无力回答车站职工关切的询问。我们松开背包，摊手摊脚地坐在车站休息室里，静静地享受着这真正意义的休息，体会着这极度紧张后的放松，这是何等地幸福与陶醉！甚至，没有一个愿意弄出一点声音来打破这幸福与陶醉中的宁静，

突然，一个车站职工惊慌地撞了进来，焦急地说：

“你们后面，还有一支步行队，里面有、有……年龄很小的学生……”车站向我们求援了。这种小站，一个多余的人手都难找，这样困难的救援工作，非我们莫属。我看了看大家，心里有底了：上！于是大家系紧鞋带，扎好腰带，我带头冲出了休息室，就在屋子的拐角处，一阵锐风挡住了我的呼吸，我忙用戴着老羊皮手套的左手去掩口鼻，口鼻还没有掩住，那齐肘长的

老羊皮手套，竟然被狂风扯下卷走了，我下意识地抓，手套已如纸片似的飞出丈外，眨眼就无影踪了。这时我觉得左手奇冷，呼吸格外困难，忙用右手掩住口鼻，躬身弯腰有如拉纤般艰难前行，左手暴露在寒风中刺骨的冷，但很快就不觉了，因为我使出吃奶的劲在顶风前行，每迈一步都要付出全身的力量，热汗从额上沁出立刻变成了寒气，呼吸粗重困难，但我们仍然一步一步艰难前行。

一个多钟头过去了，天已向晚，风力却有增无减，估计距离，我们才行进了千米左右，抬头看看，竟然一个人影也没有。我心里急躁起来，免不了要从坏的方面去想，但我又暗自下定决心：不见人不收队，不然还叫什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突然，迎面一个巨大的身影，脚在前身仰后地猛撞过来，我们相互一愣神之间，他牵着一个小小个子从他手中脱了出来，我见那小小个子一直腰就有被风刮走的危险，我忙用没有戴手套的左手把他紧紧抓住，转身跟着他快跑了一阵，才后仰着身体把脚步压慢下来。

几分钟后，两队人马都进站了，大家此时才真正松了一口气，原来这第二个步行队是独山子石油学校的，大部分是维吾尔族学生，那个小小个子是15岁的维族少年，是跟着他兄长一块儿来的。维族学生拿出酒和干粮来表示谢意，车站也端出热腾腾的馒头为大家开宴压惊。

“大肉（猪肉）的有没有？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汉族兄弟，出多少钱我们都愿意买。”

车站职工比了一个表示没有和无可奈何的手势，这时候大家都不由得想到了肉香，从踏上征途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尝过肉味了……但大家仍然兴致很高，用馒头下酒也丝毫没有影响欢乐的情绪，大家互通姓名，相约西安、北京再见，直到晚上10点。我们第二天要早走，才依依不舍地相互告别，那维族少年不会汉语，却用眼神向我们表达了感激和依恋之情。

#### ◇ 玉门之夜死里逃生

走出风区之后，大家的精神都轻松多了，一路上有说有笑，并不感到寂寞。队伍中最沉默的是卜顺清，他几乎只用眼睛说话。吴疆也不爱说话，而喜欢用琴声来表达感情，在哪里停下，哪里就会响起他的琴声。我们曾路过达板城，每个人的眼睛都在寻找歌中唱过的长辫子的漂亮姑娘，但结果都是失望。地平线上，有时突然浮现出楼阁亭台，壮丽而飘渺，我们都情不自禁奔去，好久才明白，原来那是海市蜃楼。

在乱石、沙砾和极少的草丛中，一注清水把我们引入到一个绿树成荫的村子里，那不是海市蜃楼，是安徽的移民种植的葡萄园，我们误入这片与世隔绝的地方，引来的是深深戒备的目光。我们识趣地悄悄走了，然而，第二天，我们就住进了军营里，战士们恨不得抱我们去吃饭，抱我们去睡觉，以便让我们节省脚力好赶路。最遗憾的是铁路线远离人烟，使我们失去了对民俗风情的更好了解。但铁路员工的热情、关爱和豪爽，足以使我们终生难忘。

即将走出新疆的时候，我提了一个建议：背包实在没有什么作用，行军以来从来都没有解开过，何不把它们送回去呢？经过商量，决定由姚太运乘车送背包回乌鲁木齐，我们继续前行，在地窝铺车站会合。两天后，我们走到了地窝铺车站。姚太运当晚也乘车赶来了。他喜气洋洋地告诉我们，自治区党委把他当贵宾接待，表扬我们这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名副其实，对我们把自治区支援的物资原封不动退回去的作法也大加赞扬。大家都高兴地睡了一个好觉。

第二天，从地窝铺出发，预计天黑之前赶到玉门。没有了背包，人人都感到说不出的轻松、惬意，虽然是长途跋涉，但还是忍不住蹦蹦跳跳，一上午不觉之间就过去了。午饭后上路，步

子便越来越沉重，人人都感到了倦意，我们终于发现，从地窝铺出发，一路都是往上走，而且越走坡度越大，怪不得这样吃力。我们小心了，尽量少说话以节省体力，然而，路程却是那样漫长，漫长到了不可忍耐，天色也慢慢黑下来……

忽然，我们看到了灯光，在高高的远处，灯光亮了！玉门就在前方，像是注射了兴奋剂，一双双沉重的腿变得轻松了。这时偏又起了风，风不大，却是逆风，好像专门考验我们意志似的。玉门灯火辉煌地在远处招手，我们艰难前行，听得见每个人的喘气声，一个小时过去了，玉门仍然是那样灯火辉煌，似乎是你前进了，它也跟着后退，永远保持着这样一段不可靠近的距离。

正当我在盘算怎么办时，一辆空着的解放牌汽车鸣着喇叭在我们身旁停下来了。

“天太晚了，路又太陡，大家上车吧！”司机热情地招呼道。我看了看大家，身体最强壮的綦建安点了点头；吴疆没有吱声，他是最认死理的，连他也没有提出“步行队不能坐车”的异议。可见全队情况不妙。我挥挥手：“上车！”

没有谁反对，大家都往车上爬。不料，谁都爬不上车厢板，只能靠在那里喘气。最后是你帮我，我帮你，司机也来帮忙，大家才上了车。

晚上11点，我们已在玉门市内的接待站住下了。怎样吃的饭，怎样洗的脚，大家都忘记了，这是步行串连以来第一次享受到旅店的温暖的客房。屋子很高级，密不透风，炉火正旺，让人只想摊开四肢酣睡。我和姚太运、吴疆住一屋，綦建安他们三人住隔壁，我们都太累了，无暇品味这高级客房中新被新褥的柔软与肥皂香，只想尽快入睡以消除这份过度疲劳。我躺在靠门的床上，虽然双眼紧闭却无法入眠，纷乱的意念和影像在头脑中飘来飘去……

“煤气，煤气！”我被姚太运用脚蹬醒，听见他耗尽最后一点力气的呼喊，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翻身下床开门，可是，哪里能够动弹，头脑是清楚的，心里是火急的，就是身不由己，连坐起身来也休想不到，我无力地挣扎了几次，一只手搁在了门柄上，集中意念，把残存的力量都运在手指上，心里默祝成功，“咔嚓”一声，门开了，一股新鲜的冷空气扑进房间，呆了一会儿后，姚太运也挣扎着把窗户打开。两人连忙去敲隔壁的门，却毫无声响，我俩砸开窗户，跳进去打开了门，再忐忑地开了灯，心头吓得乱跳，三个人都面色灰白地躺在床上。好在他们不久就悠悠醒来，我们相扶着来到院中，呕吐得一片狼藉，每个人都觉得天旋地转，四肢无力……

大家都庆幸这次脱险，我却感到极大的不安，深深地责备自己：倘若全军覆灭于玉门，即便只是一个人遇到不幸，都无可辩驳的是自己的责任，太过于赶路，太过于冒险，戈壁滩上几乎迷失，风口上呈匹夫之勇，以及今天的玉门，所幸的是还搭了那三五里或七八里的车，残留下那么一点点力气，也许就是那一点点力气使我们得救！

#### ◇ 见识了惊人的穷困

我们被迫在玉门休整了三天。从玉门出发后，大家的那种急躁情绪减小了不少。

进入甘肃以来，我们都感到甘肃和新疆有很大不同，甘肃的铁路站和城镇相连，虽然贫困，却有人烟。沿途都有红卫兵接待站，看来我们在新疆戈壁的一个多月中，步行串连已风起云涌，大有泛滥之势。接待站里吃的虽有，热馒头却变得非常稀罕，永远不变的主食是玉米糊糊，公正地说，它还够稠够味，一点都不掺假。主菜则不敢恭维，那已经成“布”的老萝卜熬了一大锅，从早熬到晚，熬出那黑褐色的老汤，在锅里咕嘟咕嘟翻滚，好象在说“爱吃不吃，爱吃不

吃!”火车站已不担负接待任务——他们本就不应该担负，新疆的火车站是出于戈壁没有人烟而不得已，可我们对沿线职工的热情与真诚却永远难以忘怀。而这时接待人员的脸色却不好看，冷冰冰的一付公事公办的样子，一句多余的话都不会说。我们便宁愿去挤工棚，住农家，苦是更苦一点，但却能看到笑脸，体味到那已离去的真诚和热情重新到来。

一次，大概是过了酒泉赶往张掖的途中，我们住进了一户农家，主人的年龄在四五十岁左右，很难作出判断，黑黑的脸上有两朵“高原红”，这是此地人的标志——颧骨上两块太阳留下的紫红色，他眼神机灵，待人也很有热情，一再说灾年没有东西招待客人，哪一年丰收了，可又不知道有没有客人来临。我们早就听说甘肃很穷，但到底怎样穷法，还真缺乏感性认识，这天算是开了眼界：他住的窝是里外两个洞，我们和他在外洞谈话，外洞与里洞间挂着一条破布，可能是防止外人向里窥探，其实哪里需要这条破布，里洞漆黑一团，没有孙行者的金睛火眼，是什么也看不见的，用它来挡风寒，又能挡住多少？我们刚进来时，听见有女人说话的声音，现在已寂然，很可能是主妇和她的女儿，传说，甘肃的穷家，十七八岁的闺女都没有裤子穿，只好躲在家里避冬，是否属实，谁又敢谁又愿掀开破布走进去看个真切？

晚上，我们躺下了，当然不是躺在床上，而是床的代用物——土台上，它也不是北方通常用的炕，它是实心的，无法在下面烧柴火，此地可能也无此奢侈的习惯。粗糙的土台上什么也没有，没有被褥席之类的东西，一块缺了一小半的破土盆上堆着取暖用的煤球，半熄半灭地燃烧着，不知道是透出了一丝暖意还是让人感觉更冷，原来那是从铁路上扫下的煤灰，拌着马粪制作的燃料，“暖意”可能就是从那臭烘烘中来的。土台上还有一堆棉絮，棉絮而叫“堆”，是因它不是整块的，而是一缕一缕地堆在一起，几乎就是擦过不知道多少次车子的绵纱，只是更黑更脏而已。我们都是和衣而卧，彻骨的奇寒使我们相互靠得很紧，可那“棉絮”却没有人敢去动一动。

天刚发白，我们就带着歉意悄然离开了，我们不应该来打扰这家农户，从而逼使人家展示了这惊人的穷困，还夺去了人家唯一的御寒之物——“棉絮”，虽然我们知道那条破布后面是更加惊人的穷困。

那天晚上我们曾对送回去的背包有过短暂而又强烈的怀念。

#### ◇ 隧道历险

体力日益下降，我们不得已缩短了每天的行程，也再用不着以站计程了，走到那里都可以吃，可以住，只要你说“吃定了，住定了”。所有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我们也学会了这种语言，个子高大的基建安就经常扮演这个角色，特别是他那一口纯正的京腔，真是打遍天下通行无阻。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现在好像漫山遍野都是步行串连队，其中自然也有出来混吃混喝的一——老萝卜汤也照样有人来混喝，所以接待任务特别繁重困难，经常搞得老萝卜汤也没得喝，能躺下身体的一角也找不到……

有一次，我和刘磊磊走在队伍后面，边说边走，不觉已进入一个隧道。对我们来说，走隧道已经是家常便饭。从乌鲁木齐出发，沿途不知钻了多少条隧道，我们自认为早已成为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开初遇到长隧道，黑咕龙冬的，照着手电走还战战兢兢，现在是无论多长的隧道，哪怕伸手不见五指，只需一根竹竿，敲着铁轨以定方向，不用眼看，保证步步踏在枕木上。所以，我们走隧道的时候已经没有平常人的警觉。

已经走了很久了，拐弯了，我俩还谈兴正浓，我正在绘声绘色地介绍家乡的水美鱼肥，突然，背后的强烈光柱射亮了整个隧道，惊天动地的轰隆声使人心惊肉跳，列车以排山倒海之势

从我们后面冲过来了！我叫了一声“跳！”便拉着刘磊磊的手飞身跃向旁边的掩洞，可他竟碰在了洞口边被弹了回去，只因我还拉着他，这一带之力使他倒在了掩洞旁边而不是铁轨上。在这生死一线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我无暇思量就扑在了他身上，一只手还死死地抠住掩洞边缘。列车风驰电掣般开过来了，那巨大的声响和强烈的震颤，使人心惊肉跳，列车急驶卷起的风又使人觉得时时刻刻都能把自己卷了进去。我此时感到列车实在长得可怕，那声响，那震颤，那风力，和漫长的噩梦一般总过不完……

列车过去了，死亡擦身而过，可怕的似乎只是死亡前一霎的感觉，我挣扎着爬了起来，看刘磊磊，额头青肿，满脸黑糊糊的，还惊诧地直眨眼。我抠住掩洞的那只手，四个指头都已经皮破血流，全身也似虚脱一般，没有一点力气了。我们就坐在掩洞旁，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往隧道外走。刚走出不远，就看见姚太运他们几个回头来找我们了。

此后，步行串连的路程都很顺利，祁连山、河西走廊，给我们留下了绝不亚于新疆戈壁的印象，尤其是那里的苦寒及在苦寒中不屈的人们。在武威，我们找到了一家天津饺子馆，为此特意在武威休整一天，一天三顿，顿顿吃饺子。然而上路后又一切照旧，亲亲的玉米糊糊，亲亲的老萝卜汤，甘肃呀，甘肃，你的贫穷我们已尽收眼底，难道你还要用这种方法向我们哭穷么？

1967年2月中旬，我们到了兰州，这是离开乌鲁木齐两个月零五天后到的第一个大城市，我们大吃特吃后向西安进发。沿路上都听到停止串连的消息，好在我们又不坐车，腿长在自己身上，倒没有受多大影响，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到了西安，就很难再往前走了，北京已拒绝接待，西安大概也不会放行。

我们就这样结束了那次充满惊险历程的步行串连。

~~~~~

## 【不堪回首】

### 扫地出门记——记哈尔滨师范学院的文革

• 倪美生 •

1966年3月南方已是莺歌燕舞的春天，哈尔滨市的大地还冰封雪飘，太阳出来了，也是一点暖意没有，人人见面小心翼翼，不说话，脸上一片迷茫，空气紧张，因为文化大革命转入了本单位。

哈尔滨师范学院党委书记作了动员报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派’分子长期霸占着我们的讲台。这种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散会出来，多数人垂头丧气，像霜打的茄子，我思想想不通，不管是谁，只要你党委书记一句话，谁敢再站在讲台上讲课？不是你们叫上课的吗？现在说人霸占、统治，良心何在？人格何在？道德何在？党委把教师们都抛了出来，让学生们贴大字报，点名批判。随着形势进一步恶化，姚文元炮制了《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汉奇他们既批判它们，又针对大字报的批判联系自己作自我批判，自我检查。真是人人自危，大有剑拔弩张之势，空气紧张到极点。不久，莫名其妙地学生又造起党委的反来，大字报说：“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右派分子抛出来，是转移我们斗争的大方向，他们是墙上的皮，豆腐渣，一碰就倒，是一堆臭狗屎。我们的目标是要坚决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这些学生真是吃了豹子胆！他们那柔嫩的肩膀上能压上多少斤的政治巨石？他们有多少青春黄金时节？劳改农场吞没了多少赤子的才华。195

7年的阴影还盘旋在我的脑际，受冤屈、受歧视、受污辱的情感还在我心灵深处时时作痛，旧疮未愈，汉奇又再次被批判，受辱、受屈又增添了新疮。我日夜提心吊胆，心上像压了几百斤的铁块，同事们见了我，脸上像挂了霜、封了冻。

因为我们不知道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给宋硕、陆平、彭佩云贴大字报的事，只看到我们学院某些老师也参加到学生给领导贴大字报的行列，造反，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心里烦闷之极，既担心自己的爱人，又替这批人捏一把汗。“造党委的反，这在当时中国人的心里，无疑产生着巨大的震动。很多人对1957年的反右运动记忆犹新。”确是这样的心情，学院就出现了两派：“造反派”和“红色赤卫队”（造反派称他们为“保皇派”）。也有胆小怕事的，一时看不准风向的，称为“观斗派”。出身不好的，有所谓这样那样问题，都在“观斗派”之列。于是，出现了这样局面，一派造反，一派保，学院到处门上、墙上、地上是大字报，搭席棚也不够用，最后用绳子系在两面树上，往绳上挂大字报。造反派贴了，保皇派用大字报覆盖，反之，一样。校院里五颜六色的碎纸随风飘，哪儿都是乌烟瘴气，乱七八糟。学生、老师一堆堆，一块块，辩呀，驳斥呀，辩得唇干舌燥不休息，围观的人还劲头十足，站几个钟头腿不酸，坐山观虎斗，在背后人人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平时，礼堂开会，让我和“右派学生”、“反革命”在馆里工作，就因为我是“右派”老婆。一天礼堂开会让我去了，大致内容说，有坏分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趁毛主席号召的文化大革命，造党的反等等（详细记不清了）。散会一出礼堂大门，还没下台阶，第一眼就看到一篇好几米长的大字报，报头画了一条丑陋不堪的大毒蛇，从礼堂大门平台到台阶下面，一直铺出去好多米长。大字报是贴政治系一位党员老师的。当时我的头“嗡”的一下，几乎晕过去。我为汉奇担忧。虽然大字报骂他是臭狗屎，但他是我的爱人、孩子的父亲，他没有罪而在受罪，我害怕形势越坏，对他越不利。我没有心思看大字报就回家了。到家全身疲软，心情再次像块铅，整夜整夜不能睡着，饭量本来不大，此时就更吃不下。白天还要上班，强打精神天天看“革命派”的脸色，领导的脸色。

那位政治系造反老师被画成一条大毒蛇，是“钻进党内的野心家……”第一个被“开刀”后，忽然造反派的大字报少了，没有了，校园里一下子变得树叶掉下来都嫌声音大了。原来师院驻进了“工作组”，凡是造反积极的就是右派。前阶段贴的所有大字报全被撕掉，剩下那些残碎的纸片，在风中凄凉地飘荡着，整个学院像一个庙观，校园里看不到几个人去走动，造反派都在宿舍里写检查，有的涕泪滂沱，有的悔恨万分，也有的不服气。“红色赤卫队”正好相反，止不住满脸喜色，骂我们“保皇派”，就是保对了，就是不能造党委的反。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工作组”又神出鬼没地撤走了。忽然大字报又出现了，写着要“工作组”陶某来校检查，贴出：“镇压革命群众没有好下场……”后来陶某果然到学院来检讨。因为大字报越来越多，呼声越来越高。

此时学院办起了“劳改队”，汉奇和被抛出来的教师一起劳动改造。他们被定名为“黑帮分子。”

6月1日，领导通知，晚上有重要广播，家中有无线电可以在家听，没有的则集中听。于是一个教工食堂、三个学生食堂、一个二层大礼堂全坐满了。此时，汉奇不能回家住。我心情沉重，思绪万千，又害怕，在家也无心听这个重要广播。第二天一上班，我们就学习《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文章，以及昨晚向全国广播的聂元梓的大字报全文。《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及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文中号召革命派“无条件地接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坚决予以“斗争”，“彻底摧毁”。《人民日报》社论《触及人们

灵魂的大革命》又号召人们 “做彻底的革命派，不当动摇派，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些文章出来以后，哈师院的造反派贴领导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像潮水般涌来。红色赤卫队的大字报少了，心中虽是不服，又没有底、茫茫何处是彼岸？

1966年8月5日，报纸登载毛泽东在中南海贴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报道毛泽东接见学生的情况。毛泽东的大字报一出来，真是“一石激起千重浪”，也点燃了一把天火，全国青年学生沸腾起来了。报纸上连连登什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6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等。

像潮水一样的大字报“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铺天盖地在一片大字报、口号声中，我校的造反派夺了党委的权。院党委书记、党办主任，院长助理一千人都被揪出来示众，在礼堂开大会批判斗争，脸和手都要自己涂上墨汁，黑脸黑爪子，腰里扎一条草绳，草绳在身后长长地拖着，名曰：狐狸尾巴。戴高帽、大弯腰、挂牌子、剃阴阳头……。黑帮陪斗中有汉奇。

8月30日下午1时，我出门去上班，看见一辆小轿车停在二幢党委书记门前，亲眼看见他下车进门，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的草绳尾巴，脸和双手黑黑。就是这天半夜里有人敲我家门，我心惊胆颤地问是谁？原来一人问吴医生是否住在这里？我未开门告诉了他。第二天早晨我刚出门，有人告诉我：党委书记——一把手在厨房吊死了！我心里一震，昨天半夜里敲我家门问医生原来就为他。昨天上午他被揪到八区与省市的领导一同从早晨挨斗到下午。他曾讲过“士可杀，不可辱”的话，所以他走上了这条宁可死不可辱的道路，他是我校文革开始以来第一个牺牲品。

9月30日，中文系一位副教授吊死了。他被抛出来以后，批、斗、游不算，抄家时发现，他家挂的毛泽东像的框架里面垫了一张小孩画的动物，这还得了，红卫兵说他把伟大领袖比作动物，“罪该万死”！在批、斗、游声中加上了打骂声，家中妻子儿女与他划清了界线，批斗回家没有人给他做饭吃，自己又不会做，绝望中，做了文革祭坛上的第二个牺牲品。

为了证明自己是真正保卫毛主席的革命派、红色接班人，在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摘帽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的形左实右的路线下，师院附中的老师也被揪到礼堂批斗、挂牌子。我第一次看到女老师剃阴阳头站在台上示众。汉奇及其他“牛鬼蛇神”关在历史系一间教室里，门楣上大书“狗洞”二字，这些人进出，不许用脚走，要四肢着地爬，因为他们不是人，是狗。艺术系老师从三楼爬到一楼，从一楼爬到三楼。这么污辱人、折磨人！我一生从没有看到或听到人的尊严、人格被侮辱到这种地步！

一星期汉奇回家一次，拿了换洗衣服马上回去，不准在家过夜，每次回来，我总问他怎么样？他也总说：“很好，你放心吧。”一次他回来，坐在沙发上问我：你摸摸我的脉搏，是否跳跳停停？我把一会，是有停跳，我说：你心难受吧？他说，没有，很好，我只是确定一下是否有停跳。他年近60岁，但以往没有高血压、心脏病。当时，我缺乏这方面的知识，相信了他。其实他在半年多时间里挨批斗、辱骂、担惊受怕，在焦虑、折磨中已经得了心脏病——心脏早搏。在历史系里斗他，学生打他。一个姓张的无耻学生因上课时老说话，汉奇批评过他，这时就报私怨，用铜头皮带抽打他。一个姓吴的无耻学生，人家说他冬季戴皮帽的样子学曹汉奇（皮帽双耳扇沿耳朵折到背后一结，比散开在风中一扇一扇要好看些，耳朵也保暖些），为了划清界线，狠打汉奇，还让他在操场上跑圆圈直到晕倒。当时我不敢打听他的消息，以上这些情况他不告诉我，都是别人后来告诉我的，我怕他难过，也避而不提。

我为汉奇心疼、担忧、气愤、不平，我觉得这些污辱人的人没有心肝，是野兽、是兽性发作。由于我整夜整夜不能睡觉、吃不下饭，每天还得到班上去。1966年10月间一次在班上，我心脏忽然狂跳不止，非常恐怖，下身排出热气，要拉肚，别人送我到医务室开了点药吃了后好了些，过了几天在班上又犯了此病，医生说我得严重神经官能症，给我开了镇静药水，后来改吃“冬眠灵”，开了休假条。回家后，我想着白天还看到的党委书记，夜里就吊死了，耳边就老响着一个声音，要我试试看（上吊）。汉奇回家，我把这情况告诉了他，把他吓坏了！这时大儿在师大附中高中毕业了，他要出去串联，一切都准备好了，汉奇不让他走，与两个弟弟轮流在家看住我。我病得很重，汉奇请假陪我到医院去，在路上、在车上、在医院，我总是低头不能看人的脸，一看，我就要炸了似的糊涂，因为我老想着人的脸太丑恶了、灵魂太丑恶了。他们无中生有，捕风捉影，似是而非，生搬硬套、造谣中伤、逼供信、刑讯、抄家、打骂、唱“鬼嚎歌”，唱毕，还要自己喊：“我有罪！我有罪！”还要喊自己的名字打倒自己，如：汉奇喊：“打到曹汉奇！打倒曹汉奇！”听了第一声，我不但低头，紧闭双眼，又用双手指塞住耳朵，我真怕自己疯了，拼命克制自己的情绪：“我不能疯！”“我不能疯！”“我疯了，汉奇怎么办？三个孩子怎么办？他们还小！这家不完了吗？”“我就这样天天自己和自己的胡思乱想斗争，真是痛苦极了！有一个时期，一次吃四片“安宁”，睡醒了又吃，吃了又睡，如此折腾了一个多月。

家窗外的一根电线杆上有个大喇叭，从早晨一直喊到深夜一二点钟才停止。我十分需要安静，但是一分钟也不让我休息。我躺在床上像念巫咒似的：“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不停地与喇叭抗争似的念！念！念……这时我突然有种反抗的醒悟：一、我不能疯，疯了，家也完了！二、疯了。让人家笑话，我绝对不能让人家看笑话！

我服了一年多“冬眠灵”，白天服四片“安宁”睡觉。我问医生，“我嗓子眼里总有一个东西堵着，不能透气，我能不能疯了？”医生说：“你是典型的神经官能症，不会疯的。”这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但是，老天知道（如果有天的话），我是用了我全身所有的力量来跟我的胡思乱想、喇叭的嚎叫声的斗争，才免于使自己步入疯子的行列的。举个小例：以前，我打什么针、吃什么药，从来没有顾虑过，病中拉肚，吃“绿霉素”，本来很简单，一吞就完事，可是这次，我手托着两片药，从房间到厨房七八次问汉奇，吃了不要紧吧？（我病重期间，红卫兵允许他在家一星期。）也从此以后，留下了个后遗症：什么针都怕打，一听要打针，全身紧张，发麻。

我从1966年10月病倒至1967年3月下旬到图书馆上班。上班前第一次照镜子，发现乌黑的头发有了白发。到图书馆，看到有解放军驻进来。原来造反派在全国夺了各单位、各部门的权。1966年毛泽东臂带红袖章，以红司令的身份，八次接见红卫兵，支持并激起了全国青年和群众大串联，北京的交通、住宿、吃饭等都成了严重问题，工人无心生产，农民无心种田，学生无心上课。造反派中，因意见分歧，都认为自己一派最正确、最革命，展开了派性斗争，发展到手拿棍棒，头戴柳条帽、甚至动用枪炮打派仗，打死打伤都有，因此毛泽东派军队进驻各单位、各部门解决派性斗争。有的参加革命领导小组工作。名曰“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名称谓“军训队”或“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所谓军训，各系学生早操时间由解放军带领跑步；举枪射击训练。图书馆的解放军是一位长官，每天上午领着大家学习语录和老三篇及报纸有关“文革”文章的社论。但不久，解放军又不知为什么撤走了。我这个“摘帽右派”不敢闻、问，在旁就像看变戏法一样，眼花缭乱。

汉奇他们历史系学生曾经贴出大字报指名骂八人为“八大怪”，他们不是人、是妖怪。这八人是曹、苏、游、戚、周、孙、张、孙。都因这“八大怪”使哈师院历史系在黑龙江省出了大名。哈师造反派第一个在学院办起了一个政治监狱——“政管室”。把各系被抛出来的教师都关进政管室。这些人上午红卫兵监督劳动，下午写检查、交待问题，晚上互相批斗，红卫兵在旁



监督看热闹。

汉奇长期遭到打、骂、斗、恐吓，人格污辱，精神压抑，心身都遭到极度摧残，身体垮了。一次两人抬四连木椅，走到半路不行了，只好停下来，跪在地上大喘气，心脏狂跳，几乎要从口腔蹦出来。就这样子，回到政管室，还遭到批判，写检查，如何对待劳动态度，如何从劳动中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下午名谓学习，根据需要，随时随地就会遭到批判。个人历史翻过来倒过去地交待、认罪、批判，一遍一遍地交待社会关系。

在那个黑暗的恐怖时期，在恶劣的环境中，度日如年。日子一天天、一月月地过去，春天的花朵，夏天的炎热，秋天的夕阳，冬天的银装素裹，都好像没有过着，没有一点感觉，一切都视而不见，脑子里，天天，每时每刻在只有阶级斗争恐怖的这根弦里浑浑噩噩地把日子混过去了。29年后的今天。回顾那段日子，天天除了恐怖、害怕、紧张外，根本感觉不到外界的一切。

1968年四五月间，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在大礼堂召开了三次大围剿会。造反派黄某和郭某（女）在台上对着麦克风声嘶力竭地叫喊：“我警告你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的问题你心里明白，我们也清楚，我们早就掌握了你的材料，就看你自己是否主动坦白？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想蒙混过关是过不了的。只有主动坦白交代一条生路。”“你们互相看看坐在你旁边的人脸色是否变了？苍白了，涨红了，发黄了，我说他心里有鬼！立刻把他揪出来示众！”

在一片阴风惨惨的气氛中，遮盖了四五月最美的阳光。在俯拾皆是的阶级敌人，阶级斗争的时期，坐在礼堂的每个人都胆颤心惊，那里还能想到春光明媚、鸟语花香呢？清理阶级队伍，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修正分子、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遗孽等。这些被揪出来的人统统清理到“政管室”里去。

造反派和保皇派原是两派死对头，造反派胜利后，在他们的“杀回马枪”“反戈一击有功”的感召声中，有的人站到了造反派一边，始终保皇一派改组为“捍联总”。在清理阶级队伍时，两派各指责对方队伍不纯。为了表示自己的队伍是最革命、最纯洁的队伍，各方都把“不纯”的人，不管年龄大小，都抛了出去，如家庭出身不好的，“五一六”分子，动摇分子，投诚分子等。一面表明自己是革命派，拼命清理“阶级敌人”，一面表明自己是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打派仗。

“政管室”设在文史楼，现在那里又私设一个监狱——隔离室。被隔离的人，都是被他们怀疑隐瞒了特务、国民党员、历史问题、地主等身份的人。要他们整天坐着交待历史和解答各种问题，是“五一六”分子也被隔离交待问题。隔离室里有时说你交待问题不老实，也批判斗争。如果本部门要“提审”你了，要批斗你了，给你挂上牌子，上面写上你的罪名，由本部门人来领你去，审定了，批斗完了，仍由人送你回隔离室。私设公堂完全像国民党的正式衙门。

隔离室里的制度是：谁都不准说话，怕串联，怕“订攻守同盟”。有时，如喝水、上厕所，都要举手“报告”，红卫兵同意了，就可以站起来说事情，或走出去倒水。上厕所不能一人去，红卫兵指定一人陪着去，说是怕“畏罪自杀”。家里送来的物品都交给红卫兵（不准探监）检查过，由红卫兵交给你。如是药品，红卫兵留下，按定量监督着给你吃，吃完要张嘴给他（她）看过，是否吞下了。晚上一个教室睡八九个人，不准闭灯，起床也要报告，指定人陪着上厕所。

政管室此时与刚成立时不一样了。被政管人白天整天劳动，打扫公共卫生，扫厕所，到菜

窖清理烂叶，到印刷厂叠页等等。晚上交待问题，检举揭发、思想汇报、学语录：《一切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一直搞到晚上11时，斗争开始了，二百多人围攻一个人，拳打脚踢，嚎叫声远达数百米，似狼哭鬼嚎一般，闻者胆战心惊，不寒而栗，被斗人之屈辱、冤屈、痛苦可想而知，一次后勤一位工人，说是隐瞒了地主身份，在隔离时“不老实交待”，送到政管室，第二天回到隔离室，两只耳朵肿得像两只猪耳朵，都翻过来了，脸青一块，紫一块。有的人被斗完以后，正精疲力尽，不让睡觉，挂着牌子，悬空站一晚，不准靠墙，第二天照常让出去劳动。

汉奇就在这个私设刑讯的地狱中关了两年多。一次在食堂，我突然看到他眼镜没有了，满脸肿胀，青里泛紫黑，我的心像刀割、针刺，满眶热泪强忍着不敢让它落下来，因为几个红卫兵在看我，我赶快掉转头不敢再看我的亲人了。事情是这样：1938年我虚龄17岁，跟着大同学一起去乡下参加抗日工作。我参加的团体是浙江省湖州市菱湖镇的民众团体“国魂社”（后来知道它是党的地下团体，《国魂社史》现在还提到我的名字）。——由它派我到德清县——也是群众组织——提工队工作。由于国民党县党部的钳制、阻挠，经费来源又缺乏，提工队解散，我由国魂社派到农村教书。这一段历史，工作时已交待清楚。在清理阶级队伍中，1968年5月18日。图书馆一个负责人到家对我说“院里领导要和我谈谈”，我交待了大孩子几句话就跟他去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在文史楼一楼东面是政管室，西面又办起一个“隔离室”。）到了文史楼西面一间办公室就再没有回去，隔离了十个整月。我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据说汉奇档案里不知被谁塞进一个什么“特务组织里当处长”（真假不知道），于是逼问他我们如何认识到如何联系，如何当特务，又如何结婚的。这根本是莫须有的事情。我们俩与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汉奇说我那时是17岁的学生参加抗日工作，是个民众团体，唱的歌都是抗日的，什么《在松花江上》、《延安颂》、《游击队之歌》、《义勇军进行曲》等等。政管室头头——政治系学生丛××立刻劈头盖脑地打，骂他不老实交代。在怀疑一切，刑讯逼供的恐怖情况下，汉奇始终没有承认。到晚上丛某组织了被政管的上百“犯人”围攻来打汉奇。丛某说，先让他站在凳子上，打死了我负责！于是把他从凳子上打倒在地，再让他站上去，再打下来，最后站不起来了，一把抓起他的衣领，拎起来再打，——如此轮番打、踢不休，最后汉奇被打得口吐鲜血跪在地上喊：“毛主席救我！”“红卫兵饶命！”

由于我参加抗日工作时年龄小，许多事情不知道，所以隔离十个月，一份证言也没有打过，于1969年3月放我出来了。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在三次大围剿中，职工、学生、工人，有跳楼的、有上吊的、有卧轨的，有跳松花江的，失踪的，据说共死了十六人。隔离室和政管室两大梯形教室都住得满满的，加上各种各样学习班，全校揪出了“阶级敌人”二三万人。

所谓开“宽严大会”，群众都坐在礼堂里，“阶级敌人”一律在讲台的地下室听。一个典型例子是：在第一次宽严大会上，宣布中文系一位王老师的罪行，他早时参加过共青团，又入了党，后来又参加了国民党，成了叛徒，再后来参加了国民党的一个特务组织。造反派头头在大会上说：论你罪行可以“判死刑”。

第二次宽严会上，头头说王××他不但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还积极检举揭发了别人的罪行，立刻在大会上宣布“从死刑改判为20年徒刑”。

第三次宽严大会，从20年徒刑到“当场释放”。可以回家了。此时恰值冬季，头头在会上宣布：他立了大功，检举揭发了一千多人的叛徒，特务、国民党员……等材料，为了嘉奖，“我们还派人到你家中帮助糊窗户，发困难补助。”后来有人说，因为他的胡说，我国驻外一位使节被召回国来受审。在宽严大会上，每次都有一二个人被穿制服的人铐上手铐投进了监狱。典型

的是生物系一位六十余岁的王宗表老师，她是留学法国的。文革前可能与人谈到过江青，文革中成了现行反革命集团的头子，三进三出监狱，在监狱里冬天睡在水泥地上，全身浮肿，据说要枪毙她，因为上报到她参加的一个民主党派，没有批准，捡了一条性命。放出来后，我亲眼见她手拿一根拖布棍当拐杖，蓬头赤脚穿双破鞋，颤颤巍巍拖着双脚移动，样子真像祥林嫂在风雪之中的那段场景。后来平反，病死在北京。

到1969年冬政管室撤消后，姓王的检举揭发的人全部材料推翻了。我曾问过一位“专案”人员：姓王的真的检举揭发了一千多人？他笑着回答：“没有。大概有五六百人。因为他参加过共青团、入了党，又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认识的人很多，而且记忆力特好。”我又问：“他揭发这些人真的都有问题吗？”答：“哪里，他全推翻了。我们一趟一趟到他家去问他，当对他怎么检举这些人，现在怎么又推翻了？他说是被逼出来的。”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的“成绩”。

我被隔离审查十个月，1968年5月18日—1969年3月下旬在隔离室时，发现崇拜毛泽东的许多新举措到了疯狂的地步。首先是不管在何种场合下，哪怕两三个人谈话，都要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一边喊，一边手捧“红宝书”（毛泽东文章中摘下的短句，或一篇文章，汇成的一本小书，俗称“语录本”又称“红宝书”）。举起来晃三下；打电话，拿起话筒，第一声双方都需要喊一声“毛主席万岁”才能说话；跳“忠”字舞，大家围成一个圆圈转，嘴里唱歌颂毛的功绩的歌，同时手举语录本，头抬起来望着语录本上毛的头像，唱到“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抬头仰望天空的太阳。跳“忠”字舞，不管男女老少，不论时间地点、场合，只要说跳“忠”字舞，大家都得围拢来跳。跳不跳，是对毛忠不忠的问题。我刚出隔离室不会跳，也只好跟着转圈。这个“忠”字舞影响可大啦，不管街道、广场、车站、码头、田间、地头、饭前、饭后、白天、晚上，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能看到这种不伦不类的狂舞。因为谁也不愿被人加以对毛泽东不忠的罪名。大字报、小字报、传单、读报，凡是不小心写错一个字，或读错一个字，如“无产阶级”写错或读错成“资产阶级”就被视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谁不跳“忠”字舞，就是反对毛泽东，更是罪上加罪。

“早请示，晚汇报”：每天一上班，由单位造反派一把手带着大家面对毛泽东像起立，手捧“红宝书”，他说句，大家跟着他原话说一句，例如要开会的内容啦，工作啦，读报啦。实在没有话可汇报，也要说几句：我们跟着你老人家革一辈子命啦，永远忠于你啦，誓死保卫你老人家啦，使红色江山永不变啦等等。下班前也照样重演一遍。有的人，在家中也要领着全家立在像前作早请示，晚汇报，这是对毛泽东最最忠心的了。更可笑的是，家家在家中早、中、晚三餐，在吃前，先盛一碗米饭或馒头、饺子装在碗里供在毛泽东像前。我发现这个情况，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不是对毛泽东的活祭吗？我认为这不是忠于毛泽东的举动。谁都知道，中国老百姓除供佛供神仙外，只有死了人，供灵台时才一日三餐把吃的东西只盛一碗供上，子女表示孝心，平辈表示思念不忘。而一个活人要是知道了，迷信说法是“倒霉的”。可是中国这个无神论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个对个人崇拜到了疯狂，迷信达到顶点时，就出现了这种可悲、可笑、可嫌、庸俗不堪的事。而且这种疯狂、迷信遍及到穷乡僻壤，谁也不敢出来阻止。我在家中，没有什么可“早请示，晚汇报”的，也没有供奉。那时我想，如果我真正这样做，倒是对毛泽东不最大的不尊。

再来谈谈政管室。它每到深夜11时后开始批斗，一百多人围住某一个被斗的人，拳打脚踢，推来搡去，耳光连连。打倒在地，一把拎起来再打，直到打伤，打趴。外语系一位老师被当场打斗而死。每天都能看到几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人出来劳动。罚站、罚跪在毛泽东像前，请罪、反省那是最轻的了。

“革命”两派分化，所谓一派“站错队”的，轻者则进“学习班”，那里也有批斗的。如果

逃跑，一旦被抓住了，不得了，一位姓穆的党员教师上吊自杀了，据说他爱人清理他的尸体时，发现内裤全是血。又听人告诉我，另一派在他生殖器上动非人刑罚。

早餐、午饭、晚饭，教工食堂先让群众吃完了，然后这三四百牛鬼蛇神分几列排着长长的队去食堂吃饭。一进食堂，先向毛泽东像前弯腰自报罪名，请求宽恕，然后才能买饭。主食只准吃高粱米和苞米茬子，大米饭不准吃，菜只能吃咸菜、白菜帮子，一日三餐天天如此。

一次一个劳动小组来晚了，粗粮已卖完，炊事员就让他们吃包子，他们不敢，炊事员只好把锅底、盆底刮出来的给了他们，其中一个姓周的教师吃了包子，回去向组长（也是牛鬼蛇神）一汇报，就挨了批斗。第二天中午，食堂人最多的时间，让他胸前挂一块大牌子，站在最高的凳子上示众，自报嘴馋请罪，还自己打自己嘴巴子。

被政管人劳动，是编小组的，由造反派指定其中一人负责当组长，回来向头头汇报一天劳动情况，谁劳动好，谁劳动不好。所谓劳动不卖力的，先向毛泽东像请罪，晚上再批斗，因为他不老实认罪，不好好改造，有抗拒情绪。

政管室里百分之九十是各系老师，百分之十有“走资派”、工人、站错队的。这些人在斗别人时，有的人不忍用力打人，因不动手不行，头上有人监督着。少数的为了“表现好”，为了“早日解放”，为了“立功赎罪”，成了野兽，前面“嘴馋”的那位，就是打手之一，真是一句俗话：“同类相残”。所有打死、打伤、打残、留下后遗症的，都是这些打手的“功绩”。

政管室的丛××，本是政治系学生，长得又高又大，非常结实的一个人，先是保皇派，后是造反派，所以让他全权负责政管室这些“牛鬼蛇神”。起初，他还像个人样，到“清理阶级队伍”时，他的样子就不可一世，身披军大衣，在风中一飘一飘地，你可看到他腰里别着一把木壳枪，走路大摇大摆，后面跟了四五个小喽啰造反派保镖，真是丑态百出，他还自以为神气十足，因为他有权，随便可以打人、骂人。不管过去是他的领导还是他的老师。他打汉奇一巴掌，脸立刻肿起来，一拳就把他打到对面墙角去。政管室不知多少人被他打倒、打肿、打伤过。冬天，滴水成冰的严冬，一位年近70岁的化学系李老师，身患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脚肿得不能走路，尿尿都拉在棉裤里，臭不说，冬天一出去，裤裆冻成一个冰砣，把大腿跟都磨烂了。丛xx在训话时说，“我们这里单治各种高血压病”，不让他回家治病。不久他就死了，死前躺在床上只是痛哭。有的人有病，挺不住，也不愿到医院去，去医务室拿点药对付。因为他们每人平时外衣上都别着一块白布，布上写明是什么性质的“罪犯”，如“特务”、“历史反革命”、“走资派”等，走在路上，乘车、到医院，随便什么人，连小孩子都可以打他们，医生一看这种人，也不好好看病，敷衍了事。

政管室里也是不准说话的，有事举手报告，才能行动，他们白天劳动，晚上批斗别人或自己；学习毛著或语录结合自己写批、骂自己的材料；劳动时，有什么思想活动时，回来写思想汇报材料，也要痛骂自己犯罪，又如何经过批斗挽救了自己。还有就是写检举、揭发别人的材料。宝贵的生命和时间，就在这法西斯统治的黑暗时期中流逝。

1968年七八月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和“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哈师院。这年元旦，一位肥头胖耳大腹便便营级军官孙××，把隔离和政管室的人集中在一起训话。他指着这些坐着的“犯人”说：“你们，嗯，我老实告诉你们，嗯，你们这些人之中（把手一举一甩），有的完全够枪毙的资格！”（一面用手点来点去，走来走去。）接着又说：“你们之中极大部分可以判无期徒刑！嗯，可以这样说吧，你们之中每个人都够判刑的！。所以没有枪毙你们，判你们刑，坐牢，那是党想挽救你们，对你们宽大，这就看你们自己认罪不认罪？是否彻底交待了自己的罪行，丝毫不隐瞒，还要积极揭发检举别人，争

取立功赎罪，才能减轻你们的罪行，得到党的宽大处理，如果你们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顽固到底，也可以，那就怨不得别人了。”真是一篇威胁、杀气腾腾的元旦训话。

我从农村插队回校后，打听这位军官，他们告诉我这位保卫钢铁长城的军官复员回山东老家了。临走还从学校办的钢铁工厂拉了一车皮钢材、木料，回老家去盖新房子，享清福了。不久，又听说他得了脑中风。瘫痪在床上了。不知他还记起元旦使“罪人”胆战心惊的讲话否？

1969年10月13日，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戒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称“第一个号令”，简称“一号令”。哈尔滨师范学院不管是“解放”出来的干部、群众，还是“解放”了的牛鬼蛇神，都学习“一号令”，主要学备战需要，城市人口要疏散到农村去。不久，听说那些“走资派”干部到“五七”干校去了。那些有各种各样“历史问题”的，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通过体力劳动，转变立场，改造自己的反动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为了把这些人全部赶到农村去，不管毛泽东批示的“除老、弱、病、残者外”……想出一招，让那些“造反派”、“捍联总”头头做动员工作，让那些“革命”群众对有这样或那样问题的人，一个对一个动员，名称叫“一帮一，一对红”，帮人者是不用下乡的。被帮者不下去不行。最恶劣的行为是，夫妻或父子、母女、兄弟不在一个单位工作的，对方单位不想把此人下放，述提出理由不能下去的，我们学院有的人竟找到对方单位向那里的领导人做说服工作，使用了这种卑鄙手段，结果老、弱、病、残没有一个不下去的。

帮助我的对方原是一个图书馆部主任，捍联总头头，兼专案组负责人，就因为我是江南人，平时就对东北的生活不习惯，何况下乡呢。故想以势压我。而我却在学习会上要大家表态时我说：“我不要‘一帮一对红’，凡是有人活的地方，我倪美生也能活下去。”这是出乎大家预料的，那位要帮我的头头脸上露出很尴尬的样子。可我心里很得意，你不是要“帮我”吗？我偏不要你帮。

当时，只要我肯下乡，男方跟女方，女方跟男方，怎么跟法都可以。还可以回老家去插队。这使我心里一动。我找图书馆姓张的工人师傅要求回江南舅舅家插队，他不同意。说曹汉奇（我爱人，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改造好了，还可以教书。我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我说：“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摘帽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还能教书吗？我们愿意一辈子在农村扎根，改造一辈子，永远不会教书，也永远不回城，所以才来要求到南方去。”说完，我就走了。不是我不礼貌，而是低头太多了，再说他们决定好了，求也无用。

与此同时，“专案组”迅速给“有问题”的人做结论。有的暂时做不了结论的也赶他（她）们下乡。

一天，历史系把汉奇叫去，很晚才回家，垂头丧气地坐在床上一声不吭，脸上有泪痕。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历史系海xx的专案组给他做了历史结论：“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并且签了字。当时我急了，埋怨他不应签字，“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对我们孩子的一生不完了吗？汉奇说：“我不肯签字，求他们宽大，为了我孩子们的前途。”海xx说：“你不签字，我定你为‘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对你的孩子更不利。你考虑吧！”就这样，汉奇含着冤屈，流着悲痛的眼泪在威逼之下签了字。我还能说什么呢？

催促下乡紧锣密鼓，历史系是到出鱼、出大米的玉常县营城子插队。按理我得跟汉奇随历史系去。我想南方去不了，虽然男方可以跟女方去插队，但整人的人是不会让我们如愿的。而历史系那里的某些失去人性的人，使我感到厌恶和害怕。我把情况分析给汉奇听，要他跟我随图书馆到双城某文革公社兴农大队去插队，他同意了。历史系来人还是动员我们跟他们去，说那里出大米，我是南方人喜欢吃大米，那里还有鱼，所以去那里好。我对来说，我们不去，

不想再和知识分子在一起，汉奇跟我随图书馆下去。这算是碍了他们，丢了他们的面子（就我们一家没跟去），想出了一个圈套，要汉奇办一个手续，写个不去玉常的申请。我知道没有好事，坚决反对汉奇写，我说对他们说明白了，用不着写，何况有规定，男方可以随女方下去。老实的汉奇不听，写了。结果系里当众宣布，曹汉奇，我们不让他跟我们下去，他写了个申请坚决要去，玉常、拉林有飞机场，他这种人能去吗？我们不批准。从这么一件小事，就可看出历史系某些人的手法是多么恶劣。我们幸亏没有跟历史系去。后来知道，下去的人，被公开宣布每个人的“历史问题”，在大队地头批斗，要贫下中农对他们监督劳动改造。甚至把家庭妇女也因丈夫关系拉出去批斗，这种极左恶劣作风达到令人难于想象的地步。

1970年的11—12月到1971年的二三月份，在哈师院天天能看到用战备汽车“飞亚特”拉着全家送到乡下去。我也拿着补发的一部分工资买了三吨煤、一千斤木条、铁炉子，等等。我们家家具不多，书可不少，还有一套线装的二十四史，因为线装书怕潮没有东西装它们，后来想到到商店去买柳条编的装水果筐和装烟的大纸盒。结果连筐带盒装了十七八箱。一天正在装时，突然来了一个历史系造反派学生，对汉奇说：你都下乡了，不知道几时回来，回来能不能教书也不知道，你的书都用不着了，送一些给我吧。我一听就特别生气，便冷嘲热讽地对他说：这些书不能送你，它们都是封、资、修的东西，是抄家焚烧的对象，送给你不是对你放毒吗？他听着也不说话，就是赖着不走，汉奇挑了一套大概有七八本的平装书给他才走的。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我们家五个人，每人每月只13元生活费，我在隔离室不知道，还寄条要大儿子给我买点烟。大儿还按照我的习惯每月给外婆家寄十元钱，不久邮局退回来——此人死亡。1968年秋冬，大儿到宝清兵团，每月有了32元钱，他每月给两个弟弟寄20元。他走，我们未见面，过后一个工人师傅告诉我，说他到兵团去了，这是组织上还信任我们，否则他去不了兵团，不让我见面为我好，要安心好好改造。可我听到这个消息怎么也定不下心来，他去兵团被褥衣服怎么办？家中尚有一个14岁一个8岁的小孩无人照顾怎么生活？我没有外调，也没有可交待、可揭发的材料，开会学习时面前摊开一本毛选就呆呆地坐着想孩子，日子一多，红卫兵发现，就说我整天坐着，不用脑子想问题，说“你要那么干净，就不用进隔离室了”。没有办法，硬着头皮看毛选，写思想汇报，一篇二篇……。红卫兵又说了：你的思想汇报就像小学生写的。我实在写不出来，不写了，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一天，隔离室的负责人告诉我：你儿子要和你们划清界线到××农场去工作。我说：他不能去，他还未成年，没有独立生活能力，我不同意。可等我1969年3月出隔离室回家，只见门敞着，三儿孤零零一个人躺在床上睡着了，见我进来醒了。我问二哥呢？他说到××农场去了。他见我回来很高兴，告诉我家中积存了好多豆油并拿给我看，我吃了一惊，问：“你们怎么没吃呢？”三儿流着眼泪说：“没有钱买菜，每天就是酱油拌饭吃，盐又黑又脏又粗，买的煤也是最便宜的，我不会烧，烧不着我就吃夹生的。”听着儿子的话，我的眼泪像淌水似的流，心疼得说不出话，可怜的孩子！我心里大喊：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我的孩子犯了什么罪？！要受到这种虐待。

不久二儿子回家一趟，我对他说，你这么小就到农场去，怎么生活？你走了，弟弟这么小无人照顾，无人作伴，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是历史系造反派硬把他的户口迁出，赶他到农场。我问农场怎么样？是些什么人？你做什么工作？他说：是一个劳改农场，要他们看守劳改犯，劳改犯竟和他们讲如何偷东西的故事。我一听心里马上决定：决不能让他再去。于是我就找有关方面，申请不能到那个农场去，我们不要这32元。回答只有插队。后来二儿到通河县依山公社依山大队插队。

1971年2月初，离春节还有四五天，二儿从插队地回来过春节，碰上我们也要去插队，我就带着二儿、三儿在白天气温都在零下20多度的凛冽的西北风中坐上搬家车去双城某文革公社兴农大队落户。

□ 节选自“远方出版社”：《那个年代中的我们》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